

全球化与中国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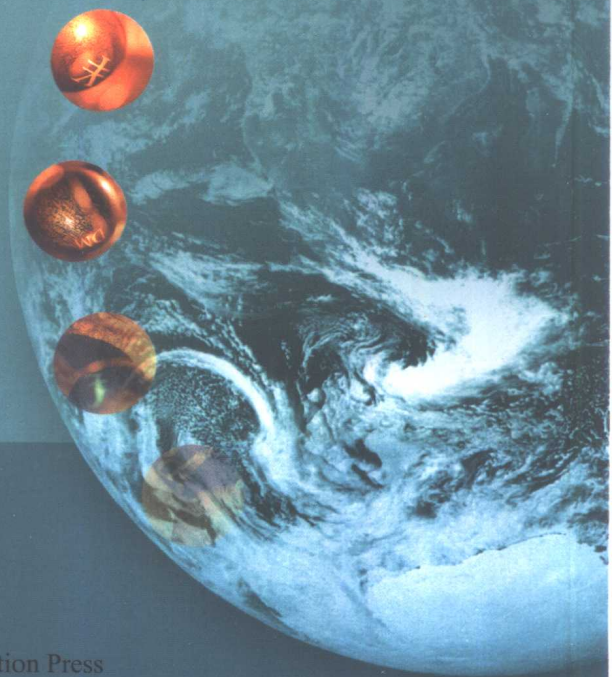
竞争的极限

LIMITS TO COMPETITION

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

里斯本小组/著

张世鹏/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竞争的极限

——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

里斯本小组 著
张世鹏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权图字:01-1999-1471

© 1995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Group of
Lisbon, and the Gulbenkian Founda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 2000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本书中文版由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授予中央编译出版
社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里斯本小组
著;张世鹏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

(全球化与中国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Limits to Competition

ISBN 7-80109-369-0

I. 竞…

II. ①里… ②张…

III. 国际经济关系-经济一体化-研究

IV. 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999 号

竞争的极限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71396(发行部) 66117130(编辑部)
E m a i l cctp @ public. east. cn. 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
印 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875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19.50 元

序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汪道涵

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尤其值得注意。东亚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不适应性与不合理性。加强国际金融监管,防止新的危机爆发,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紧迫任务。在此背景下,人们十分关心中国经济的走向,探讨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为此,我作几点分析,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一、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

经济的跨国发展和国际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或更久以

前。经济全球化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获得巨大发展，各种国际经济机制开始形成，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各国经济互相渗透、互相依存，趋于一体。到8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已经显露。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刚刚起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偏低；信息技术的手段不足，经济全球化进程尚缺乏巨大的物质保障。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出现历史性变革，经济全球化呈加速发展之势。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加强了相互依存的全球分工体系。信息技术促进全球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使经济周期律出现新的变化。今天，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

就总体和长远而言，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它推动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有助于国际贸易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供求平衡。它也有助于生产要素流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促成新兴资本市场的崛起。1990年至1997年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金增长了5倍，年均流量达2650亿美元。总之，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和机遇。

然而，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宁静的伊甸园，有时会带来风暴和灾难。过快推进经济全球化可能导致市场破坏性力量的膨胀。特别是国际资本的巨额流动和国际金融投机活动的规模远远超过许多国家的抵御能力。经济无国界化使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空前巨大的压力，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更应引起注意。

显然,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新兴市场的的不稳定性对发达国家也产生了强烈冲击。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消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可能陷入困境,发达国家最终也难以独善其身。

经济全球化还暴露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不适应性,迫使人们反思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公正性与合理性。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正在形成一个共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共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与改革。目前我们正面临多年来难得的南北合作机遇。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历史性要求:一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二是宏观经济调控特别是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这两种要求应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过去 10 年间,国际经济组织和发达国家片面敦促发展中国家加速自由化进程,却放松对国际流动资金的监管,忽视其稳定世界经济的责任。国际经济机制呈现严重的不平衡状态。

因此,改造和更新国际经济秩序,应以加强国际金融监督,重建国际金融秩序为起点。当务之急是防止国际游资和国际债务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构成新的冲击。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金融体制不健全及外债负担过重,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爆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危险。发展中国家所欠债务已在万亿美元左右。一旦触发连锁反应,必然影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因此,发达国家尤其是具有全球金融影响的大国,有义务、有责任采取主动行动,积极防止和抑制国际资本的过度

投机和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困难,避免出现新的危机。

严峻的现实表明,对经济全球化因势利导,兴利除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既有利于发达国家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又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提升和优化经济结构。只有这样,才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

二、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对“东亚模式”的反思

东亚金融危机集中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阶段上面临的各种矛盾。巨额外资流入可以支撑高速增长,它们的撤出也会引发急剧衰退。出口导向战略带动本国经济迅速国际化,但也掩盖了国内结构调整的滞后。一些国家尽快推进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却难以实施有效的监控。盯住强势货币的汇率制度与比较优势的不同步变化,造成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加之政府与企业结合的产业战略往往导致金融体制诸多弊端。当危机发生时,一些政府为了获取国际经济援助又不得不放弃对本国市场以及国家财政的主导权。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危机更具有深刻性和严重性。

对东亚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不应低估。受危机冲击,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5~10%,货币贬值 30~50%,债务增加数倍,并从货币金融危机转为社会经济危机,个别国家甚至出现政治动乱。东亚地区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复苏所需时间可能长于原来的预期,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趋缓。

受其影响,俄罗斯及拉美国家的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就连曾在这场危机中起过推波助澜作用的一批著名对冲基金也最终难逃厄劫。

东亚金融危机引起舆论界对“东亚发展模式”的争议。其焦点是这种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否继续保持活力并有效地运行。

坦率地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东亚模式”的结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政府干预方式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国际竞争力不足与国内市场开放过快的矛盾;高速增长与结构调整滞后的矛盾;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科技投入不足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告诉我们,东亚地区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势在必行。

尽管如此,近 30 年的发展证明,“东亚模式”是有活力,有效益的。整个东亚创造了产业革命以来最高的平均增长速度,东亚经济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3 以上。东亚国家借助政府力量,创造其发展所必需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是后发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创造比较优势,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必要战略。东亚国家充分利用低劳动力成本发展制造业,促进了全球分工体系的优化配置,也带动了自身市场的开放。“东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

挫折也可以成为“东亚模式”走向新阶段的转折点。建立有效的政府间接调控机制和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正在成为东亚国家重振经济的重大措施。建立对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加强东亚国家之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特别是货币汇率机制的合作,已成为紧迫的课题。我们相信,东亚国家目

前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它们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发展潜力仍然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与改革,“东亚模式”将得到更新和完善,东亚定能重新焕发活力与生机,在 21 世纪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坚持改革开放和保持稳定则是中国发展的基本条件。20 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为促进的关系。中国这个大市场的对外开放,正改变着国际资金和商品的流向,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潜力。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机制,为 APEC 贸易自由化进程作出了重大的努力。经济全球化则为中国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1978 年以来,批准设立的外资企业已达 30 多万家,实际利用外资 2500 多亿美元。外资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中国经济加入世界市场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竞争机制,正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已经确定为 21 世纪中国发展的基本战略。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20 个年头。经过 2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雏形已基本显现,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

济”已基本消失。片面追求产量扩张的外延式增长受到抑制。银行与企业之间正在形成以效益为基础的商业关系。投资主体正在从政府转向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同时,由于改革的纵深推进,各种福利保障转向社会化。市场机制已在商品和劳动交易、资源配置等经济领域起着广泛的调节作用。

经济社会转型的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面临着两个重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经济结构由粗放式经营转变为集约式经营。与这两个转变相一致,我们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其中包括: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改组,并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使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改造和重建金融体制并发展资本市场;扩充和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并开拓人力资本;加强民主与法制,抵制社会的腐败现象等等。

显然,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洞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国情,把握轻重缓急的不同节奏,处理好改革、开放、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坦率地说,这是十分艰巨的使命,即要有深远的战略思考,又要有高超的操作艺术;既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也需要坚强奋发的全民族的凝聚力。幸运的是,近年来中国领导权力的交接已顺利完成。新的领导集体团结、务实,富有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并有能力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诸方面的重大问题。早在1993年,当中国经济开始过热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果断地实行了宏观调控,使经济软着陆,从而避免了东亚金融危机在中

国的发生。当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波动剧烈时,中国政府承诺并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在稳定中国经济的同时也为亚太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

1998年中国政府的上述措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面对来自国内外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中国仍然坚持并基本实现了年初确定的经济目标。人民币保持不贬值,经济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在周边地区经济负增长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长率仍达到7.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8个百分点,而通货膨胀率为负数。

应当指出的是,与以往几次周期不同,这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导致重复建设,而是推进了结构调整,促进了体制改革,这不仅说明了中国政府在处理速度与结构、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中找到了平衡点,政策具有灵活性,而且说明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空间。1999年中国政府保持这一政策,一方面在积极财政政策引导下,带动全社会的投资;另一方面,国家实行敞开收购粮食的政策,以稳定农业生产,稳定并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消费。在城市则通过住房体制政策和消费信贷等多种形式来刺激消费,同时也积极采取措施,使媒体、娱乐及教育成为新的消费热点,相信这些措施是会见到成效的,199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会低于7%。

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政策开放,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东亚金融危机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政企需要分开,产权应当明晰,政府的作用是纠正市场失灵,维护公正,间接调控,而不能包办代替。1998年来,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始终遵循了这个原则,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适当的货币政策仅是帮助启动经济,而不是代替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政府机构的改革为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正稳步进行,清理整顿金融机构,关闭了一些有问题的机构,党政军机关与所办的企业脱钩,加强法制建设,培育基层民主有长足的进步等。这些都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条件,也使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展望未来,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的改革开放战略将得到坚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方向不会改变。一方面,开放国内市场还大有潜力,中国的庞大市场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始终存在。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地区间的经济技术转移与开发将为国际产业转移提供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竞争的局面正在出现,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和机制已经展现,抵御各种风险的物质技术基础初步奠定,它构成了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而改革开放20年来体制的创新,思想的创新,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创新,则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创新精神,它深植于当代中国社会,成为这个民族的灵魂。正是这一创新精神,将揭示21世纪中国发展的主流。

中国古代诗人屈原有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艰巨的。经济全球化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道路更需要时间。人类不会畏惧路途遥远而止步,更不会因为道路曲折而茫然。让我们加强合作,共创美好的明天。

为了加强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探讨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互动关系,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

究所、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召开了数次学术讨论会,并决定编辑出版“全球化与中国研究丛书”。这套丛书不仅发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也翻译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我们希望通过召开学术讨论会和出版这套丛书,推动我国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译序

时近岁暮,又逢世纪之交、千年之交,在把《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这本译作奉献给读者的时候,似乎应当对这本著作的理论价值谈一点译者个人的看法。

90年代初西方社会开始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十年来,围绕这个热门话题发表的各种著述数不胜数。里斯本小组写作出版的这本《竞争的极限》已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它的主要特色,也就是它的权威性、代表性,首先在于它的19位作者分别来自8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斯本小组本身就是一个颇具全球化特色的理论研究团体和写作班子。

《竞争的极限》的另一特色就是它的标题显示出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锋芒。

众所周知,过分崇拜市场自由竞争是新老自由主义的共同特征。崇尚个人自由(特别是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灵魂,也是构成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传统自由主义把个人或集团之间的自由竞争说成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发展动力。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弱肉强食、生存竞争、适者生存,

霍布斯强调“人和人之间是豺狼”，他们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这一命题。自由主义认为，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根本无法把无数个人经济主体所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部信息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机构的手里。因此，要想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正确干预，进行宏观控制是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所以国家（或者政府）最好就是听凭市场机制潮起潮落，云起云飞，让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不要对人们的经济活动进行任何干预。国家的作用不过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对内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从政治法律的角度维护好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外防止敌人入侵。但是，传统自由主义没有想到，竞争可以导致垄断，作为市场活动信息载体的价格也可以被各种投机活动或垄断行为而扭曲变形，所以新自由主义并不像老自由主义那样笼统地反对任何国家干预，而是主张国家应在保护竞争机制、维持市场秩序、反对垄断的方向上进行干预。这就是新老自由主义的主要区别。

80年代初，随着美国里根主义、英国撒切尔主义的迅速崛起和广泛影响，新自由主义的教义，包括哈耶克、米塞斯为首的新奥地利学派理论，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被大力宣传，多方炒作，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近乎狂热的新自由主义崇拜浪潮。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即自由化、私有化，放弃经济管制，被吹嘘为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药。如《竞争的极限》所说：“竞争信条的信徒们坚信，以竞争为基准的市场经济是对于世界范围内经济与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的惟一有效答案。他们的信仰不仅覆盖了发达国家，而且扩展到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地区、所有公司企

业。”“全面制定与运用以竞争为取向的市场经济原则与规章来驾驭世界经济与世界社会,被看作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里斯本小组批评说:“如同任何一种片面幻想与极端化意识形态一样,竞争能力的教条是在一种简单化设想基础上产生的。它主要依靠的观点是:我们的经济与社会正在全球范围内陷入技术战、工业战与经济战的战争状态。所以,主要目标就是要使自己充分强大,以便打败竞争对手。”《竞争的极限》对于这种片面迷信自由竞争,把作为一种手段的竞争演变成目标本身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给人类世界带来的消极后果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里斯本小组认为,“不能把世界看作是霸权兼并的竞争场所。”“日本、北美和西欧最有影响的国家再也不能继续长期推行它们目前的政策了。”“克服过度竞争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摆脱自身生存的短期目标的时机已经来临。”

80年代初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崇拜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政治气候,在这种大气候下爆发的80年代末苏东剧变又把这种新自由主义崇拜、资本主义崇拜推向巅峰,改变了东西方冷战的世界格局。从此以后,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放弃经济管制的方针为资本全球化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促进了全球化发展进程,这主要表现为全球一体化金融市场的形成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同时还体现在原苏联东欧地区的一系列国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换。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内,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方针的恶劣社会后果。流行的说法

就是当今世界 80% 的社会物质财富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个三角地带。而在这个三角地带国家内部,80% 的财富集中在只占人口 20%、甚至数目更小的少数最富有的社会阶层手中。西方报刊已经在惊呼,即使在堪称社会福利国家典范的联邦德国,无论是失业率还是贫富分化的比例关系已经倒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即本世纪初的水平。如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中强调指出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过度放纵问题。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过度放纵,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过度竞争和严重失控曾经导致了 30 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到西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在于给这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套上笼头”。通过国家的经济干预活动,例如关键性产业部门的国有化、制定反对垄断化的经济立法、推行高额累进所得税制、扩大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扩大保护雇员权益的劳动立法范围等,国家努力通过政府的划拨福利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抑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抑制资本主义的过分放纵。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改革成果,包括政治民主化的成果,即使不是丧失殆尽,至少也是大打折扣。著名的西欧自由主义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已经提出了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未来的 21 世纪很可能是一个极权主义世纪的警告。这也就是说,经过一个世纪的曲折迂回、前进与倒退、进步与反动,人们发现不知不觉之中似乎又绕回到原来世纪之初作为起点的地方。或者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于